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建构

杨英姿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是在反思传统现代化和回应世界现代化生态转型的过程中所作出的历史选择。传统现代化由于被资本逻辑所主导而付出了惨痛的生态代价；世界现代化生态转型的西方方案则由于既没有对传统现代化的资本本性进行反思、也缺失根本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的强有力支撑而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建构的历史定位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根本目的是破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冲突的历史难题，建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双赢的内在逻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态历史观、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对生产力内涵、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重新界定，为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现实矛盾提供了本质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建构，是时代精神、实践推进和价值追求的有机统一，要以全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精神，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新进程，最终实现满足人民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人与自然和解和谐的价值追求。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建构 生态转型 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 851X (2023) 03 - 0014 - 15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学界的主要研究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阐述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历史必然和历史生成，主张坚持“两个结合”，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基础和哲学体系；二是指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人与自然和谐共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历史观维度研究”（批准号：15XZX019）。

【作者简介】 杨英姿，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南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邮政编码：571158。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9页。

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维度、本质要求，应从事实归纳性和理论规范性两个维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内涵；三是认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人民性价值取向；四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理论内涵、实践进路、现实意义的研究。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有必要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进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研究，进行哲学理念、战略部署、价值取向相统一的整体性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反思传统现代化发展利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过程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深刻的历史反思、审慎的现实考量和科学的未来预期的有机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色和本质要求，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回应现实发展难题，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内涵，昭示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建构，不是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想，而是遵循客观规律的历史主动，因而是一种历史建构，它既是接续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更是创新世界现代化发展模式，旨在推动传统现代化发展道路改弦易辙，引领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生态转型，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可或缺的生态向度和生态内涵（陈学明，2022）。

一、传统现代化发展模式及其生态转型

世界现代化进程开始于18世纪中叶的产业革命，至20世纪70年代可以视之为传统现代化阶段。之所以称之为传统现代化，是因为它具有不同于随后现代化转型发展的基本特征和本质属性，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生态代价。鉴于传统现代化发展模式所造成的严重生态危机，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化生态转型成为现实需要，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也应运而生。

（一）传统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其一，就现代化范围和性质而言，传统现代化主要是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完成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借助资本剥削、掠夺以及向全球的扩张和渗透，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传统现代化的受益者是少数国家和少数人，“在人类二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超过三十个、人口不超过十亿”^①，这是由传统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性质所注定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是以资本所有者对劳动者和自然、宗主国对殖民地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剥削及掠夺来推进和完成的，是军事侵略、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文化奴役、生态掠夺的合谋共犯，充满了对立对抗、血腥暴力。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②

① 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1页。

其二,就现代化发展模式来说,传统现代化是由工业主义发展方式、经济主义发展路径和殖民主义扩张战略共同形成的。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看,“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工业主义生产生活方式,一是造成对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和浪费,以致化石能源、生物资源等相对于当今人类的生产生活而言,其约束日益趋紧。二是造成环境污染破坏,大气、水体、土壤等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基本条件和依托受到严重威胁。三是造成生物多样性锐减和生态系统退化,从根源上损害人类生存发展的条件和基础。“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主义发展路径,以损害资源环境生态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只顾当下,不顾长远,只顾当代,不顾后代,长此以往,人类发展将难以为继。而转移转嫁生态危机的殖民主义发展战略则是一叶障目,自欺欺人,损害的不仅是他国的生态环境和生态利益,更是损害了地球家园和人类共同体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

其三,就现代化后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历史评判同样适用于对传统现代化后果的评价。积极肯定的方面在于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 消极否定的方面主要体现在资本及其主导的现代化的自身魔咒:“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② 就人与自然关系而言,资本这个“魔法师”支配不了自己召唤出来的生态危机这个“魔鬼”了。传统现代化的后果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传统现代化的范围、性质、发展模式也是由资本决定和主导的。

(二) 传统现代化的资本本性和生态代价

本质上讲,传统现代化是由资本主导的,并伴随着资本的对外扩张和全球化而推向世界,这就意味着是否需要推进现代化、推进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推进现代化是由资本决定的。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下列事实加深这一理解。现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由全球化、多边主义转向贸易壁垒、单边主义的倾向,究其原因始终在于资本逐利的根本目的。换言之,资本所考虑的不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人类文明演进这些问题,恰恰相反,资本所考虑的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人类文明是否有利于资本逐利,就像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言,“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他们能够把你们劳动的产品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你们的劳动发财,而一旦他们无法靠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赚钱了,就任凭你们饿死也不管。”^③ 也就是说,全球化、现代化、生产力发展不是资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3页。

的必然选择，当全球化、现代化、生产力发展由于历史前进出现了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不利于资本逐利时，资本就会由曾经推动全球化变成现在阻碍全球化，从与传统现代化相向而行变成与新型现代化背道而驰，从客观上推动生产力发展变成事实上阻碍生产力发展。这也进一步证明了资本的本质不是物，更不是生产力，而是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是自私自利、唯我排他、剥削掠夺的资本主义关系；进一步说明了传统现代化是本末倒置的，将本应是发展生产力之工具的资金变成了以自身增殖为发展目的的资本，将本该是发展目的的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人类文明演进变成了资本逐利的工具。

资本关系、资本逻辑具有对立对抗、征服掠夺的性质，由资本主导的传统现代化发展模式，是一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工业主义生产生活方式，是一种“先污染后治理”的悬置生态问题的经济主义发展路径，亦是一种向欠发达国家转移转嫁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殖民主义发展战略，它在人与自然关系上造成了严重的资源环境生态危机，它的推进和实现付出了惨痛的生态代价。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污染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此后，关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重要议题不断引起国际社会的热烈讨论。各种各样的生态理论反思和生态实践变革，最终落脚于经济增长方式、现代化发展模式问题上，因为人类不能停滞不前，更不能回到前现代社会去，但如果沿着传统现代化发展模式走下去，将会逐步毁掉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生态根基，最终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这就意味着在现代化问题上，我们不能也不应该选择“回归”战略、“悬置”战略、“转移转嫁”战略这三种现代化模式。“回归”战略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不切实际的浪漫乌托邦式幻想，“悬置”战略是目光短浅、自欺欺人的自杀式模式，“转移转嫁”战略则是自我排他、唯我独尊的资本帝国式选择。后两种战略是典型的传统现代化发展模式，而第一种战略只能说是对传统现代化无力抗争的逃避。积极的、历史的态度应该是承认现代化的不可逆转，进而促进现代化模式实现生态转型。

（三）世界现代化发展模式生态转型的西方方案及其历史局限

关于现代化的生态转型，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理论与实践。比较典型的是国际社会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和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由于可持续发展理论也是在资本框架和西方话语体系下形成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将它与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统称为西方方案。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是资源利用的代内、代际公平，以及在此基础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旨在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①。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人类环境与发展大会倡议各国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落实为本国的发展战略，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人类代际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与

^①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柯金良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0页。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寻求公平与可持续的发展。与此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主要在欧洲盛行起来，其内部的理论主张和环保运动虽然不尽相同，但共通之处在于均强调社会系统内部技术进步、市场经济、政府调控、公众参与等在解决环境问题、推进生态现代化、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中的重要作用。

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战略也好，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也好，它们所取得的实际成效和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其根本局限性也是有目共睹的：其既没有对主导传统现代化发展的资本进行反思、批判和扬弃的意识与行动，也没有根本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的强有力支撑。由于没有深刻认识、深入揭示和主动应对资本及其制度的非生态性和反生态性，可持续发展理论和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不论及、不触及资本逐利与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当在实践中遭遇资本的阻力，再加之没有国家制度和政权的硬约束时，环境保护就成了被牺牲的一方，可持续发展在国际社会中也就不停留于倡议、呼吁而实际上常常不了了之，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则停留于社会运动、技术和市场层面而无法撼动资本及其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的绝对统治。譬如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国际社会的所有努力都奈何不了美国拒不签署《京都议定书》，都阻止不了美国公然退出《巴黎协定》，这便是其局限性所表现的最有力证明。在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理论没有社会制度和国家权力的坚强后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强大的国家力量，为了本国的资本利益，随时对可持续发展国际倡议弃之如敝履，导致可持续发展理论在“资本+国家权力”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并且由于受制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而日渐丧失了曾被寄予厚望的全球共同应对生态危机、谋求绿色发展的可能。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同样如此，并且由于不触动资本利益，导致在本国大力倡导生态现代化理论、大力推动生态现代化实践的西方国家，却同时不遗余力地凭借国家力量为本国资本转移转嫁生态危机提供支持、开辟道路，这种内外有别、自我排他、以牺牲他者利益为代价的生态现代化，与传统现代化没有本质的区别。

就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而言，世界现代化模式的生态转型是现实需要和大势所趋，亦表明人类在对自身生存样态、生存方式进行反思反省。就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来看，其生态转型不能说是成功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这种生态转型没有突破既有价值理念、思维定式、制度框架和利益选择，既与资本逻辑相安无事，又与国家权力遥不可及，终究难免隔靴搔痒，治标不治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力求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社会制度体制机制到思想观念、文化伦理、意识形态，进行全方位的生态变革（包庆德、宁琳琳，2022）。

二、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建构的历史定位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建构，旨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历史定位是基于对传统现代化的生态反思，同时回应世界现代化发展模式生态转型而作出的历史选择，其根本目的是破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矛盾与现实困境，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两大关系的和解和谐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开辟道路。

（一）如何看待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常常被认为是一种经济关系；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也常常被归结为一个经济问题。于是在具体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实践中，就理所当然地用经济的手段去解决经济上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虽然追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是世界现代化生态转型的初衷，亦成为世界各国有识之士的共识，但世界现代化生态转型的西方方案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历史难题，依然没有走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冲突的现实困境。这说明，单纯局限在经济视域看待和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理论上流于表面，实践中治标不治本。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看似一种经济关系，但不能局限于此看待二者的关系。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进入人们视野，是因为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出现了历史勾连，这一历史勾连让人类发展陷入二难选择。然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对立冲突固然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出现的，但它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由经济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整体性的人类生存发展问题，是如何选择人类生产方式的格式塔问题，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相统一的问题，是宏观、中观、微观相协调的问题。那么，看待和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也要坚持整体的、系统的、联系的观点和方法。

首先，要从世界观、自然观的角度理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本质关系。在形而上层面，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关涉的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两个存在，是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看作彼此对立的两个世界，还是认为它们是一个共生共荣的共同体，是把自然界看作机械僵死的无机界，还是认为它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有机界，这样截然不同的两种世界观和自然观，形成关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本质关系的不同理解，对于在其他层面理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

其次，要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待关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制度性影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现实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不同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二者的重要性不是完全相同的，人们对于二者关系的看法也会随之不同。在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人们会更看重经济发展，而随着生产力发展的突飞猛进、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以及生产力作用于自然界的力量越来越大，环境保护逐渐进入人们视野和生产生活中，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成为必须予以关

注和处理的重要对象。同时，不同的生产关系形成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社会制度形成不同的劳动关系、分配关系、利益关系等，这些都会影响和左右人们对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看法，进而在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做出取舍。

再次，要重视生产生活方式、现代化发展模式对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现实关系的直接影响。资本逻辑、工业主义、物质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主导下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现代化发展模式，必然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重视前者，忽视后者，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且在经济发展中重数量轻质量，高消耗低产出多浪费。反之，如要推进高质量发展、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必须首先放弃“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现代化发展模式，选择和实践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现代化发展模式。

最后，要从利益选择的角度理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价值关系。利益选择受制于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构成、社会制度性质等，但不唯如此，利益选择是在客观规律和主观意愿共同作用下作出的。在这个意义上，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认识和处理是有价值取向的。以资本逐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传统现代化和不触及资本逻辑的西方生态现代化，不会做出牺牲资本利益来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选择，不可能从根本上达成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脱钩的目标。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则不能、不会选择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而是会从根源上去破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冲突的历史难题，去建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双赢的内在逻辑和发展格局（黄承梁，2023）。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表象，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的动态发展关系，既是经济关系，又不仅仅是经济关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所在，而解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冲突的历史难题、建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双赢的内在逻辑，是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建构的关键所在。

（二）解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冲突的历史难题

在传统现代化发展模式下，经济发展造成生态环境退化，保护生态环境则会阻碍经济发展，这似乎是一种必然。于是西方国家选择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悬置环境保护的发展道路，而当资源环境生态问题恶化为危及人类生存发展的全球性危机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逻辑驱动下又走上了转移转嫁生态危机的道路，同时又抛出了既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又具迷惑欺骗性的、拒绝现代化发展的所谓“回归”战略。真正的历史必然是，人类社会的存续既不能没有经济发展，也不能不要生态环境保护，所以让人类社会停滞不前的“回归”战略是行不通的，“先污染后治理”的“悬置”战略是走不远的，而“转移转嫁”战略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制造着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还制造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少数获利者与社会大众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资本所有者与资本剥削对象的矛盾，所以也是不可取的。

经济与生态环境不能两立——经济发展造成了生态环境退化，保护生态环境阻碍了经济发展，这看似不争的事实，实则是提出了转变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要求。是什么样的、怎样的经济发展损害了自然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生产力发展的内涵和标准是什么？——是单纯的交换价值、GDP增长吗？可以肯定的是，以资本获利为核心的交换价值指标不能科学地界定经济发展程度，更不能标识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因为物质财富不是由交换价值、而是由使用价值来定义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①；以资本获利为核心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或“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发展模式直接造成资源环境生态危机，将这种发展模式视为生产力发展、经济发展，是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异化表现，不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不二选择。当扬弃异化的发展阶段到来的时候，再固守这样的发展标准和发展模式，就因不合时宜、违背规律而变得十分荒谬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际社会曾提出了用发展（development）代替增长（growth）的主张，意味着单纯的GDP增长并不能涵盖人类社会的发展，一味地片面追求经济数量的增长，有时反倒会损害、阻碍人类社会的发展。

认识到传统现代化发展模式是造成资源环境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解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冲突历史难题的第一步；认识到经济发展、生产力发展的标准和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应该遵循历史发展客观规律适时、及时地修正标准、充实内涵，是解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冲突历史难题的更进一步；认识到传统现代化发展模式及其经济发展、生产力发展的标准和内涵是在资本逻辑主导下为资本逐利服务的，则找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冲突的根源，找到了解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历史难题的枢纽；而创新绿色发展理念、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向度，则是开启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双赢的建构之路。

（三）建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双赢的内在逻辑

内在逻辑不是脱离实际、违背规律的主观臆想，而是现象背后的本质、历史事件背后的历史必然。建构内在逻辑，是在深入观察、研判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和深刻揭示。资本逻辑是传统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是造成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冲突的根本原因。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要有本质上区别于资本逻辑的内在逻辑支撑。因此，建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双赢的内在逻辑，旨在重新审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内涵以及二者之间的本质关系，寻求二者协调双赢的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态历史观、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对生产力内涵、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重新界定，正是在深刻洞察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问题的本质和关键的准确把握，成为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双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总结历史、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当下实际相结合，洞察到生态环境兴衰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至关重要的作用，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生态历史观，将生态环境兴衰演替纳入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内在规律之中，从历史观维度建构起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双赢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摒弃西方近代以来将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隔绝对立起来的二元论世界观，继承发展马克思关于自然史与人类史实践统一的思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文化，形成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这一理念将人与自然是共生共在的生命有机体，为建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双赢的内在逻辑提供了本体论、存在论支撑（李培超、戴晓慧，202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绿色生产力观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① 经济发展的核心是通过生产力创造使用价值和物质财富，以此改善人民生活境况，提高生活质量，丰富人民生活内涵。生产力如果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却破坏着资源供给、生态基础和生存环境，那么这样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则已经落后成为一定程度的破坏力了，因此需要进行创新变革。同时，随着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健康安全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优美生态环境也成为生活必需，这使得传统现代化发展模式下的生态负效应以及相应的环境保护问题成为关注焦点。因此，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纳入保护和发展的内涵中，进而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观，既是对生产力理论、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发展，也为经济发展模式、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生态转型提供了根本依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②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根基上破解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对立冲突，“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发展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③ 一方面，传统现代化模式下经济发展造成环境退化，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天然对立、不可共生的关系，而是因为传统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出了问题，不再适合历史发展需要。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竭泽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13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61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52页。

而渔”被历史地证明是难以为继的，而生态环境保护的“缘木求鱼”则是违背自然规律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倒行逆施，生命共同体理念、绿色生产力观、绿色发展观的理论创新，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向、揭示二者历史耦合关系的主动选择。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态历史观、生命共同体理念、绿色生产力观、绿色发展观以及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重新界定，不仅为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现实矛盾提供了本质根据，也为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现实力量。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统一，为经济发展注入生态力量，为环境保护注入源头活水，进而创新现代化的生态内涵，构建现代化建设的生态向度，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由此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建构的历史定位，成为世界现代化生态转型的历史趋向。“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中国现代化是绝无仅有、史无前例、空前伟大的”^①，它将开创崭新的文明发展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建构的基本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创新性的历史地位，作为其生态建构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需要建构不同于传统现代化和西方生态现代化的生态内涵，以全新的生态文明理念和时代精神，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新进程，实现满足人民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以及人与自然和解和谐的价值追求。

（一）凝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精神

黑格尔说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②，马克思进一步强调“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③，反思之，正确的社会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的选择，是能够体现时代精神或是在正确把握时代精神的前提下作出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时代精神，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把握到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时代精神，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深刻洞察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结果。

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才能深刻认识、深入理解、时刻关注自然界作为人类实践领域的历史变化，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基础和生态前提的不可或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之于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才能真正将自然界、人与自然关系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要素和组成部分，逐步扬弃对自然界、人与自然关系的外化和异

① 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3页。

②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序言第1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

化,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和谐,这些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生态历史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大创新发展,是对“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深刻回答,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握住了时代脉搏和历史发展趋势,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精神奠定了科学的历史观基石。

“究天人之际”是中国哲学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问题,而“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物我一体”是对这一问题的根本回答。“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这些观念都强调要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按照大自然规律活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表达了我们的先人对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认识。”^①“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物我一体”等思想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质关系,以及人类实践活动循天道、守时禁的根本要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生命共同体理念、永续发展观、绿色生产生活理念以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等理念具有鲜明的中华文化基因,特别是“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生态自然观,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精神提供了科学的存在论支撑。

时代精神来自思想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精神来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和中华文明生态文化启迪下,对全球资源环境生态危机的本质、影响及其解决之道的深刻把握。在哲学理念和时代精神层面,全球性资源环境生态危机的产生,源自人与自然二元对立观念和资本主义精神的驱动,其将人与人的关系样态排除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内涵之外,以资本逐利为核心目的,人为地、片面地、断章取义地、自欺欺人地对待自然规律,设定唯经济论的社会发展指标,以致在经济指标中又故意无视生态成本,其结果已经不言而喻了。正是全球资源环境生态危机的现实,警醒人类反思生存理念,重塑时代精神,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郁庆治,2023)。

(二)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建构,需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的实践支撑,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新进程的实践推进。新格局、新进程是创新发展理念、优化国土空间格局、转变发展模式、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其一,绿色发展理念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新进程的思想先导。“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②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既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守住生态底线,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又不能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不要发展,

① 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31页。

而是保护与发展的内在统一。既要经济发展又要生态环境保护，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精神在发展观上的体现。

其二，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新进程的自然基础和生态支撑。国土是现代化建设的空间载体，要通过建立健全空间规划体系、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和生态安全战略，明确划分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建设生态安全屏障，确保现代化建设不超过水土资源承载能力和生态环境容量。科学规划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的空间维度，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和生态安全格局，努力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譬如在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的国家公园建设，是“国之大者”，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建构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其三，转变发展模式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新进程的主体内容。转变发展模式是转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增长动力的统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根本改善生态环境状况，必须改变过多依赖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过多依赖规模粗放扩张、过多依赖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发展模式。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①也就是在供给侧推行减少资源消耗、节能减排、节约集约的生产方式，从源头上根本改善生态环境状况。而绿色发展“代表了当今科技和产业变革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②，要加快推进绿色科技创新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方式实现绿色化转型。持续开展全民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倡导勤俭节约消费观，推动绿色生活行动，促进生产、流通、回收等环节以及衣、食、住、行等领域绿色化发展，在全社会“推动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③随着供给侧生产方式的生态转型和需求侧生活方式的绿色化转变，经济增长点和增长动力也将向绿色、循环、低碳方向转换，这也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新进程的内在要求，“我们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并从中创造新的增长点。”^④经济增长点和增长动力的绿色转换，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新进程的关键所在。

其四，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新进程的外部保障和开放目标。坚持正确义利观，坚持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609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95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611页。

④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27页。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积极参与、引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生态安全、生态环境治理等全球性问题，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体系。资源环境生态危机是全球性问题，只有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在共治共建中解决传统现代化和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造成的困境，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新进程才能获得良好的外部环境，才有可能将这一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和新进程推向世界，彻底实现世界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生态转型（张云飞，2023），“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①

（三）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价值追求

从价值目标的角度看，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追求是要实现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两大和解以及在此基础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价值诉求内涵于这一终极追求，是终极目标的阶段性目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目标指向，也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大文明建设的目标指向，涵盖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两大关系。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的价值目标内涵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斗目标之中，其直接目标是建成美丽中国。美丽中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五位一体”的目标和内涵之一，“五位一体”是不可分割的，“五位”说明目标和内涵有五个方面，美丽中国是其中之一，不可或缺，而“一体”说明目标和内涵都是一个整体，美丽中国与其他四个方面有机统一，缺失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美丽中国都不能“独善其身”，比如美丽中国建设需要经济上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政治上需要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社会建设方面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文化建设方面需要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化。因此，建成美丽中国不是单一的目标，而是综合的、系统的整体目标的一个方面，它直接指向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但同时包含人与人的和谐发展（王雨辰、周宜，2023）。由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的价值目标，就同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两大和解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实现了一致和统一。

从价值立场的角度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价值诉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如果经济发展了，但生态破坏了、环境恶化了，大家整天生活在雾霾中，吃不到安全的食品，喝不到洁净的水，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居住不到宜居的环境，那样的小康、那样的现代化不是人民希望的。”^②人民的希望和诉求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和追求，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界定中国式现代化新的生态维度、充实中国式现

① 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92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604页。

代化新的生态内涵，正是因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人民的需要日趋丰富和全面，人民不仅求“温饱”，还要求“环保”，不仅求“生存”，还要求“生态”，“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①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既要给人民带来金山银山，也要给人民留下绿水青山，做到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诉求，不仅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满足人民对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的需求，还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生态利益分配关系，坚持环境正义。就国内环境正义而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人民群众的共有财富，植树造林、国土绿化要“为人民种树，为群众造福”^②，良好生态环境应该成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而不能沦为资本垄断的禁脔之地。就国际环境正义而言，强调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社会主义中国决不对外转移转嫁生态危机，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中非合作”，走的都是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追求的是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就代际环境正义而言，强调“资源开发利用既要支撑当代人过上幸福生活，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根基。”^③ 普惠性、共享性、人民性是习近平环境正义观的鲜明特质，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价值追求的根本宗旨。

参考文献

陈学明（2022）：《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第10页。

包庆德、宁琳琳（2022）：《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使命》，《城市与环境研究》第2期，第95—108页。

黄承梁（2023）：《从人统治自然的哲学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第3期，第118—129+164页。

李培超、戴晓慧（2023）：《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两个结合”》，《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第44—52页。

郇庆治（2023）：《“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析论》，《人民论坛·学术前沿》第8期，第59—71页。

张云飞（2023）：《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维度和本质要求》，《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第1—12+111页。

王雨辰、周宜（2023）：《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高度谋划发展与美丽中国建设》，《求是学刊》第1期，第13—21页。

① 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87页。

② 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48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611页。

On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YANG Ying-zi

(School of Marxism,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58, China)

Abstract: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th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which is a kind of historical choice in the course of rethinking profoundly the traditional modernization and responding the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in the world. Traditional modernization being dominated by capital logic has payed the painful ecological price. The western approaches of the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in the world, which don't rethink profoundly the capital nature of the traditional modernization and aren't supported strongly by fundamental social system and state power, are unable to solve the problems fundamentally.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historically th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its fundamental purpose i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o construct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coordinating and win-win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with ecological historical view and life community concept redefines the connotation of productivity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o provides essential basis to solve the realistic contradictions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the organic unity of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the practical progress and the value pursuit, which constructs new pattern of modernization drive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and promotes new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drive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by the brand-new era spirit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and realizes finally the value pursuit for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for a beautifu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achieving the reconciliation and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new form of human advancement

责任编辑：黄承梁